

叶亚来——巫华共同拥有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Yap Ah Loy: The Common Prec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Malaysia's Ethnic Chinese and Malay

张卫东**
(ZHANG Wei Dong)

摘要

清代移民海外的华人多在欠发达地区落脚并成为许多城市的开埠者，此乃历史使然。“甲必丹叶亚来是吉隆坡开埠元勋”，这是历史定论，不容篡改，亦无可动摇。叶亚来，是马来西亚各族合作建国的一面伟大旗帜，是巫华共同拥有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马来西亚巫华两族合则双赢，离则俱损。如何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有待马来西亚各族有识之士继续共同努力。华族可以借鉴中国的一些经验教训，将心比心，耐心等待友族“心态转变，思想开放，观念突破”的那一天。

关键词：甲必丹叶亚来、吉隆坡、开埠元勋、社会心态

Abstract

The history showed that Chinese emigrant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had settled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had become the founders of these regions. The Chinese Capitan Yap Ah Loy was the founder of Kuala Lumpur is the historical factor. Yap Ah Loy is the common preciou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Malaysia's ethnic Chinese and Mala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thnic Chinese and Malay is a win-win, otherwise, both would be lost. How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is point depends on all ethnic groups in Malaysia continuously working together. The ethnic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can learn more from Yap Ah Loy's case to look forward to other Malaysia's ethnic groups becoming change-minded and open-minded.

Key Words: Capitan Yap Ah Loy, Kuala Lumpur, founder, social mentality

*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陈嵩杰、刘崇汉先生惠赐文献资料支持，特此鸣谢。本文曾在“叶亚来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7日，吉隆坡）上宣读，会后文字上有所修改。

** 张卫东教授 中国深圳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电邮地址：zhang4612@hotmail.com

一、前言

1980年以来，不断有人挑战“甲必丹叶亚来是吉隆坡开埠元勋”这一历史定论，并进而断言“吉隆坡开埠元勋是马来人拉惹阿都拉”（李业霖 1997：261），且从历史教科书中逐步抹去叶亚来的事迹与形象。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国内的民族关系。30年来许云樵、李业霖、刘崇汉、陈亚才等华人学者和西方学者柯雪润等为此做了大量历史研究，众多华人社团亦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使历史真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了。马来西亚巫族学界、政界有识之士也曾郑重申明必须“把华人甲必丹的贡献纪录在案”，否则，“吉隆坡的历史将不完整”。¹然而，那些公开挑战者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清代华人（包括客家人）大量海外谋生，在许多欠发达地区落脚，特别是在东南亚，成为诸多大中小城市的“开埠者”。此乃历史使然。这段历史，本来是很清楚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原住民“民族意识觉醒”、政治权力膨胀，便企图来修改这一历史。叶亚来事件不是孤立的。妥善处理好这类问题，对于当地社会健康发展，对于当地华人的社会处境，意义重大，我们应予重视。

关于“吉隆坡开埠元勋”的论争，已经持续了30年，也许还将继续30年。欲知如何面对未来的30年，首先就要理性回顾已往的30年，以史为鉴。如何看这30年的论争？论争结果究竟如何？有怎样的经验教训呢？

二、30年论争之回顾

如何看这30年的论争？未来当如何？若欲明于此，首先要对这30年来个“盘点”。甲必丹叶亚来，是吉隆坡开埠元勋。自1980年，这一点屡遭质疑甚至否定，并伴随一些政府行为如修改历史教科书等。“谁是吉隆坡开埠元勋”？这是30年论争的焦点。其实质，既涉及华巫两族的历史关系又直指当下华族的社会地位问题。其实历史早有定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马来西亚领袖”条目下对叶亚来(Yap Ah Loy)历史功绩的陈述是这样的：

作为吉隆坡华人社团领袖，对于把这座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矿业中心，他有巨大贡献。……到1862年，他时来运转，他的朋友刘壬光(Liu Ngim Kong)成为吉隆坡华人甲必丹，这个位置，不只是领导华人社团，也包括马来政治组织在内，而且，到1874年英国干涉之后，同样也包括英国官员。他作为刘壬光可信赖的副手，到1869年，在刘去世后成为新的华人甲必丹，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系统与强大的武装力量。1870年雪兰莪内战爆发，叶亚来既需面对持有异议的华人集团之间的自相残杀，又要面对来自马来派系的攻击。1873年，他在吉隆坡的决定性胜利，成为战争的转折点，从而让他获得

¹ 1999年，世界客属第十五届恳亲大会在吉隆坡举行，时任首相马哈迪为大会主持开幕式时说：如果没有把客家人的事迹写入历史，没有把华人甲必丹的贡献纪录在案，吉隆坡的历史将不完整的。他说，吉隆坡三位客家领袖，甲必丹叶亚来、叶亚石及刘壬光，为吉隆坡的现代化发展建设奠下基础。

了更为强大有力的政治地位。到1879年，他差不多执掌了雪兰莪州的最高权力。作为华人社团的公认领袖，他获得了英国税务官授予的统治马来人(Malay)的领导权力，而对他的限制，他可轻易规避。战后他成功地恢复了锡矿工业，并奠定了吉隆坡作为马来半岛经济中心的地位。……1879年，第一位英国殖民官（政府顾问）被派到吉隆坡，华人甲必丹的权力始被削弱。在拥有权力与独立行动两方面，叶亚来的继任者，皆无人可及。在他手上获得极大发展的这座城市，保持了它杰出的地位，并进而成为马来西亚的首都。

（张卫东摘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卷，1977：800）

“把这座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矿业中心”，“并建立了完善的管理系统与强大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吉隆坡作为马来半岛经济中心的地位”，“在他手上获得极大发展的这座城市，保持了它杰出的地位，并进而成为马来西亚的首都”，此即肯定其为“吉隆坡开埠元勋”。这一历史评价，是以一系列客观史实为依据的，是可信的，无可动摇的。

甲必丹叶亚来病逝后，《新加坡自由西报》(Singapore Free Press)刊登这一不幸消息时，毫无保留地肯定“其丰功伟业，与对吾政府之忠诚，对吉隆坡之建设，实无与伦比者。”英驻官罗杰(Rodger)致悼词曰：“亚来之死，在政府失一干练而忠诚官吏，在余私人则失一最为亲切景仰之良朋。”（许云樵 1979：105）英驻官瑞天咸(Swettenham)更于著作中历数其功勋业绩：

华人甲必丹叶亚来，不失为雪兰莪之表率，其才见识，皆称卓越。英驻官制实施前，此市尝为巫人焚毁三次，均由甲政重建之。彼之肩此重任，均因敦孤阿乌定(Tunku Dia Udin)之恳请。彼筑漫长之公路，俾诸矿场与吉隆坡的交通，使诸华人安居此地，以迄今日。四境治安良好，实有足多。彼设收容所以纳病家，为其乡人公断是非，设窑造砖，出品精良，茨厂规模，雄视各州，机械设备，由英籍技师主持。据其自述，雇佣于其矿场、园地、砖窑、建筑者凡四千人。凡此皆造成吉隆坡繁荣之主要因素，且已成为史实。在其乡人之心目中，甲政叶来乃一伟人，令群众信服，总而言之，政府实利赖其影响力于治安，利赖其忠诚勤勉于市政之设施，以及华人之奉公守法，尤以吉隆坡为然。

（许云樵1979：105）

这些报道与叙述，是历史的见证，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述相互印证。“无人可及”、“无与伦比”、“凡此皆造成吉隆坡繁荣之主要因素，且已成为史实”等语，说的是同一观点——“甲必丹叶亚来是吉隆坡开埠元勋”。有人会说这都是“欧洲殖民者所撰写”而不予采信。然而，这些历史文献所载每一条，皆是史实，不因撰写者身份不同而有所改变。这是世界性的共识。这30年来，华社学者李业霖、刘崇汉等先生的研究与论述，为此给出了大量进一步的证明。若欲颠覆这种共识，就要拿出充分的证据，将上述史实逐一推翻。然而，回顾这30年，可以说，一条也没有被推翻，甚至未发生丝毫动摇。

在史实方面，他们捉襟见肘；其论争手法，亦非正道：

一是偷换概念。你说：“甲必丹叶亚来是吉隆坡开埠元勋”。他说：不对！“拉惹阿都拉(Raja Abdullah)比叶亚来早五年抵步”！这是把“抵步”和“开埠”两个不同概念混为一谈。华人并不否认最先到达吉隆坡这一片沼泽地的有拉惹阿都拉，但是，正如李业霖先

生所说：“发现一块烂芭地方，并不稀奇，把这块烂芭地区发展起来，建成市镇，推动历史发展，这才算有德于民，有功于国。”（李业霖 1997：261）文献还表明，除了他所控制的矿区的税收之外，拉惹阿都拉对其它事一概不感兴趣。

二是往往使用双重标准。例如，马来学者哈芝布用(Haji Buyong)1981年出版《雪州史》，书中记述：与拉惹阿都拉“同期抵步”来吉隆坡开矿的，还有两位华人——丘秀和叶四。按马来学者的“标准”，既然三人“同期抵步”，他们就应该同享“吉隆坡开埠功臣”的“尊崇”，丘秀和叶四也是“应该接受此荣誉的人”。丘秀不仅属最先抵达者，还被委任为第一任吉隆坡甲必丹，可见其地位在拉惹阿都拉之上。然而，哈芝布用却只承认拉惹阿都拉“才是真正的吉隆坡建立者”，丘秀和叶四完全被排除在外。此等双重标准，源于狭隘的民族意识，完全背离史学良心，十分不可取。尽管丘秀被委任为第一任吉隆坡甲必丹，华人学者亦并未尊为“吉隆坡开埠元勋”，这是鉴于其历史作用，是尊重吉隆坡发展史。换言之，把拉惹阿都拉推崇为“吉隆坡开埠元勋”，就是嘲弄、践踏吉隆坡发展史。

第三，凡是于己不利的史实与文献，便指为“欧洲殖民者撰写的”，或“华人的一面之辞”，是“片面的”、“不客观的”。然而，历史早由史实写定，不可任意“改写”。像吉隆坡这样一个大都会、大商埠的开埠史，是由与它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城建、移民等多方面的史实支撑的。某位历史学教授发现拉惹阿都拉在巴生港口处建造的一座货仓遗址，便宣称这“足以将历史改写。”（甄丽仪 1999：26）这是将历史学变为“玄学”再拿来吓唬人的可笑手法：用“一座货仓遗址”作支点，岂能撬动一个大都会的开埠史？

第四，还有马来朋友宣称“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吉隆坡是在何时被开发，也无从了解谁最先开始创立这个城市。”（甄丽仪 1999：27）。这是“鸵鸟政策(ostrichism)”。其心底是：明知这段历史无法“改写”，却又不甘承认华人是“开埠功臣”，于是就散布“不可知论”以混淆视听。

回顾过去的30年，我们深信：“甲必丹叶亚来是吉隆坡开埠元勋”——这个“世界性的共识”，是任何人也无法动摇、更谈不上推翻的。相信再过30年，仍是无人可以动摇的。企图翻案者，其技已穷矣，他们手法也许还能花样翻新，亦不外上述几种。对叶亚来和吉隆坡的历史研究，亦须继续加强，诸如：叶亚来年谱、吉隆坡编年史、吉隆坡移民史、吉隆坡街道史、吉隆坡矿业史、吉隆坡商贸史……都应该编写出来，让吉隆坡的开埠史与叶亚来的业绩一一展现，让史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

三、“抵步”不等于“开埠”

考证出“拉惹阿都拉比叶阿来早五年抵步”，是马来学者提出的推翻叶亚来“吉隆坡开埠元勋”最主要的论据。

据报导，1989年初，默哈末尤索夫哈欣副教授(Haji Mohamad Yusoff Hashim)“通过各种新发现的马来历史文献以及英国人的记录，可探悉拉惹阿都拉早在1857年已于鹅麦河

(Gombak River)及巴生河(Klang River)之汇流处的一片沼泽地区驻脚，这要比叶亚来早五年抵步。他提出的最有力证据是拉惹阿都拉在巴生港口处建造的一座货仓遗址”，且进而宣称：“这一种事实的重现，足以将历史改写”。（甄丽仪 1999：26）

然而，“抵步”与“开埠”，可以混为一谈吗？

“抵步”，即“抵达某处”；而“开埠”，说的是“开辟为商埠，开放港口，设立外贸口岸”。二者差别很大，是质的不同。开埠，是将一个地方建设成为有相当规模的城市，有一定吞吐量的大码头、大港口，有若干国际航线的外贸口岸。这跟“建造一个货仓”，不可同日而语。

笔者家乡山东半岛，有好几个著名商埠：烟台、青岛、龙口、威海。这些地方，先秦就已经有人居住了。《史记》载始皇东巡“过芝罘，穷成山”。芝罘，即今烟台，800年前已得今名。威海，明初设为“威海卫”，中国东部海疆最重要的抗倭军事基地之一，清代北洋水师提督署衙门所在地。但是，它们成为开放商埠，成为中国的外洋通商口岸，则是1850年以后的事。它们的“开埠者”，都不是中国人，而是英、美、法、日、德等。这些口岸的对外开放，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他们在这些口岸建码头、辟航线、办洋行、设公司、操纵贸易大权，使外国船舶自由出入往来。这些口岸的开拓，尽管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的民族感情很不舒服，但是，论及“开埠史”，我们还得实事求是地承认，“开埠者”是洋人而不是中国人。今天，我们还应该看到，这样的“开埠”，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我们再打个“极端”的比喻：大家都知道，大约在60万年前（是“五年”的12万倍！）北京猿人就到了北京房山周口店，你能据此而说“北京猿人是北京的开埠功臣”吗？显然不能。抵步，不等于开埠；最早的抵步者，不能跟“开埠者”混为一谈。“比叶亚来早五年抵步”，便从而断定“拉惹阿都拉是吉隆坡的开埠功臣”，进而否定“叶亚来是吉隆坡的开埠功臣”，这样的“论断”，是蓄意偷换概念，混淆“抵步”与“开埠”二者本质差异，所以是站不住的。

默哈末尤索夫哈欣副教授一方面竭力夸大拉惹阿都拉的事迹，另一方面则极力贬抑叶亚来的历史功绩，说他“只是鼓励采锡华人以及投资者由槟城以及新加坡集中于吉隆坡，使这里成为一个富庶生意集团环境而已。”（甄丽仪 1999：26）对比一下《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叶亚来的介绍，这种“而已”的说法，无法逃避其“蓄意掩盖历史真相”之嫌。

细心一点儿的读者还会发现，默哈末尤索夫哈欣副教授1989年的“最新论点、论据”，其实，跟哈芝布用(Haji Buyong)1981年版《雪州史》比较，没有任何进步。换言之，从1981年到1989年的整个“80年代”，持此观点的马来学者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与阐述，在“谁是吉隆坡开埠元勋”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进展。自1989年之后的第二、第三个10年，仍然拿不出任何新的论点、论据，以动摇叶亚来的历史地位。

四、叶亚来，巫华共同拥有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关于叶亚来历史地位问题，论争30年了。从我们的立场看，是非已经很清楚，作为吉隆坡开埠元勋，叶亚来的历史地位未有丝毫动摇。正如瑞天咸早年所说：这“已成为史实”。史实，就不容涂改，无可争辩。不过，这场论争还不会收场，因为这是一场特殊的论争，它已不是一场是非之争、真伪之辨，它的圆满收场，取决于对方民族意识、社会心态的调整。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的研究重点，也不妨作适当调整，譬如，今后要多强调“叶亚来是巫华合作先驱，是巫华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外学者中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李业霖先生。早在1991年《论叶亚来》一文中，他已经明确指出：

叶亚来不但能团结华人，同时也能团结马来人。他跟马来人的上层关系非常好，大家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他是实践巫华合作的先驱。他主持吉隆坡行政工作期间（1873-1880），是通过马来酋长来管治马来社会的，马来人都乐意接受他的领导。他鼓励马来人迁移到吉隆坡近郊，种植稻米和各种农作物，以供应市场所需。他传授先进的耕种经验和技能给马来农民，提高农作物的生产量。

（李业霖 1991：12）

关注马来史的美国资深学者柯雪润教授(Sharon A. Carstens) 1992年也曾大声疾呼：“叶亚来是巫华合作先驱”。（刘崇汉，1998）马来西亚史学工作者陈亚才先生2007年通过媒体呼吁：公众应摒弃狭隘的种族视角，重新审视吉隆坡的发展史。他说，华人和马来人对开发吉隆坡所作出的贡献是可以并行存在的，并不冲突。（陈丽华 2007年4月24日）

当我们说“叶亚来是吉隆坡开埠元勋”的时候，丝毫没有排斥马来族群的意思，并真诚认为：吉隆坡的开埠，是巫华共同创造的历史业绩。没有马来王室及地方领袖、马来民众的支持，叶亚来也成不了大事。“开埠”，必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多民族国家，亦必是多民族参与，参与的方式亦可能各异。叶亚来，他既是华人的领袖，也是与华人并肩作战的巫人所拥戴的领袖，是巫华两族共同高举的一面旗帜。著名前辈学者许云樵先生1979年所作《客家人在东南亚》载有大量此类材料：

1866年叶亚来继任甲政，有人不服倡乱，“幸苏丹般沙(Sutan Puasa)宣布刘甲遗命，乃得平息”。然此终为“私相授受”，1880年5月，“翁孤摩提为册封叶来为甲必丹事，征询罗哈沙儿、苏丹般沙及其它领袖，全皆同意，乃择吉行册封礼。市中处处搭棚寮，翁孤摩提率众自巴生至，特设之棚就座，叶亚来乃偕诸将入谒。翁孤即饬翁寿当众宣读华文布告，册封叶来为甲必丹。仪式至为隆重。”

（许云樵 1979：101）

雪兰莪内战期间（1866-1873），“叶来与诸巫酋相处极融洽，巫酋亦因其能节制万余华人，和睦共存而德之”。巫族领袖或资助、或策应、或直接领兵参战、驰援，给予叶亚来有力支持；华族将领部下亦常有巫族士兵。

这场内战，本是“马来统治阶层的内衅”，很快发展成为不同巫华军事同盟之间的战争。决战时刻，“叶亚来集大军，分九队，分别由邱发、叶文龙……统率，巫军亦分三队，由末亚该统率之。檳城苏丹亦遣翁孤亚曼(Ungku Aman)率所部由海道前来，彭亨军督伽闾(To' Gaja)、督迦耶(To' Kaya)率所部由陆路来。甲必丹统军围城，志素何殊死顽抗，伤亡颇重，历三昼夜，乃弃城出走……自是叶来统治吉隆坡之局面始定，虽称甲政，不啻王侯。”

(许云樵 1979: 103)

上述材料，皆来自《叶来幕府札记》，是可信的，表明叶亚来吉隆坡开埠，得到友族领袖与民众的诸多支持。十九世纪中后期马来亚拓殖的历史洪流，把叶亚来推到风口浪尖。叶亚来不负众望，引领潮流，创造了吉隆坡在短短二十年间迅速崛起，经历三年内战、三次大火、一次大水等种种磨难，赖其才识过人，艰苦卓绝，玉汝于成，让原本一片沼泽的吉隆坡，一变而为马来亚首善之地，奠定了作为马来半岛经济中心的地位，并进而成为马来西亚的首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叶亚来团结华族，团结巫人，成为巫华各族共同拥戴的英雄与领袖。只有他，有德有能，代表那个时代，代表巫华两族的共同利益；只有他，有资格代表那一段历史。而他所代表的历史，并非华人独有、而是巫华两族共同拥有——早在那个时代，巫华两族已经走到一起，“大家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成为一个民族大家庭的兄弟姊妹，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携手开创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新国家、新纪元——这一共同体，不仅创造了吉隆坡这个大都会，又一起为她起了个“客巫合璧之地名”。许云樵先生说：

叶来开府之区，本巴生土酋之弃地，故其地亦以Klang为名，客家方音不正，讹作吉隆，迨既开府，乃增一坡，以与新加坡媲美，而称“吉隆坡”。至巫名Kuala Lumpur者，实非其对音，因叶来所辟之地，位巴生河(Sungei Klang)与鵝麦河(Sungei Gombak)合流处之沼泽地，巫语呼河口为Kuala，客语称沼泽为“滥巴”，于是构成一客巫合璧之地名，居民皆数典忘故，不知所自矣。

(许云樵 1979: 104)

依此说，则不论“吉隆坡”还是Kuala Lumpur，都既有华语成分，又有马来语成分，正所谓“客巫合璧”，实属天作之合、名至实归！巫华合则双赢，离则俱伤，这是马来西亚近现代史屡试不爽的经验教训。蓄意扭曲巫华共同建国的历史，只会酿祸，不会降福。明白了这一层，懂得了叶亚来所“提倡华巫合作的精神是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刘崇汉，2010），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说“叶亚来是巫华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极为珍贵、不容糟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那段历史，准确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才能保障巫华各族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携手合作，共同建设马来西亚的未来。

五、殷鉴谅不远，他山石可借

这场论争，既然不可能很快结束，那么，如何更好地面对与处理这场论争以及类似的论争，就是我们要多加考虑的问题。个人建议：放眼世界，尤其是多看看中国，正所谓“殷鉴谅不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历史教科书问题，不用怕。教科书容易涂改，但历史却不易涂改。举目四望，“历史教科书事件”，可谓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但是，利用手中权力通过教科书来涂改历史的，有成功的吗？没有。所以，不用怕。

利用教科书来掩盖真相、歪曲历史，是专制主义常用的手法。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事件”便是一个典型事例。二战结束至今，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强调日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极力回避日本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经日本文部省修改审定的一批教科书，其近代、现代史部分，不少内容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严重地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这件事理所当然地激起各国人民的强烈义愤，也遭到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同声谴责。这一斗争，虽说仍在继续，但日本右翼势力所导演的“历史教科书事件”必将失败告终，是可以断言的。

在中国大陆，这种例子也很多。稍远的如1905年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历史教科书《广东乡土历史》，其第二课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老族，非粤种，亦非汉种”，此话是照抄上海徐家汇教堂所编《中国地輿志》。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文版《世界地理》，在“广东”条下有“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这两起“历史教科书事件”，都曾激起震动社会的轩然大波。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污蔑，遭到全国各地客家人的强烈声讨，迫使编者与出版者声明认错，公开更正，客观上也促进了客家学的研究。（张卫东、王洪友 1989：2）

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课本，讲到抗日战争，都是这么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打败了日本鬼子，而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捷报频传……当然，国民党出的书也完全抹煞共产党的抗战业绩。自1980年代开始，大陆方面的出版物开始肯定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到200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胡锦涛总书记更公开、明确地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日的“主体”。²有关正面战场地位的评价，说到底就是对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处地位的评价。历史教科书问题解决了，台海两岸的关系亦为之明显改善。这不是党派的胜利，而是历史的胜利，是史实战胜党派之争的胜利。历史证明：以势压人，专制、独裁，都不可能长期扭曲历史。尊重历史，是人类文明的本性。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文明本性，终将粉碎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的专制主义的倒行逆施。

²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抗战初期的松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一评价客观陈述了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地位。此后，大陆有关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英勇表现的史料纷纷呈现。这无论对于国共两党关系、对于海峡两岸关系、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

(二) 任何一个民族, 其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提升, 都有一个过程。走出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淖, 需要时间, 更需要自身的艰巨努力。马来友族民族意识的理性觉醒, 终有一日会实现, 对此要有信心, 要热心期待、耐心等待。为什么这么说? 作为“过来人”, 中国有这样的经验教训, 可以将心比心。且以“上海开埠”为例。

上海开埠于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 上海正式开埠, 自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2003年, 是她开埠160周年。11月26日上海《解放日报》有通栏大标题: “坦言开埠: 第一次, 上海人如此坦然地面对上海的开埠”, 下有导语: “11月17日, 上海开埠160周年的日子, 沪上媒体将一直令人痛心疾首的开埠当作一件大事, 第一次, 从容地追忆, 坦然地表述。”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教授接受采访“从容地追忆”说: 上个世纪初, 北方省份的“洋鬼子”被杀了很多, 八国联军又把北半个中国捣得满目疮痍。而上海, 始终理性地保持与外国的交往, 与世界的联系, 一跃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也因为较大的开放度, 随后的一战期间, 外国资本纷纷从战火纷飞的西方转到上海, “摩登时代”的上海, 与世界同步。到上世纪30年代, 上海已“超越”巴黎, 成长为“世界第五、远东第二、中国第一”的大都市。

通商口岸的开埠, 对后世的影响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过去我们不敢问, 更不敢答。今天我们可以实事求是毫无忌讳地回答: 是利大于弊。虽然开埠使中国大量资金、资源外流, 使中国更深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但开埠使中国与世界市场得以沟通, 冲破了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与世界接轨, 促进中国由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这是一大进步。

熊月之教授曾深有感慨地说: “上海开埠150年的时候, 还听不到什么动静, 今年160周年, ‘回避’一反常态成‘热点’。我想这不是一个偶然, 它体现了社会整体心态的转变, 思想的开放, 观念的突破。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 八个字——因为自信, 所以坦然。”(陈江 2003年11月26日)

六、结语

在“上海开埠”这一事件上, 我们中华民族, 从“痛心疾首”到“坦然面对”, 从深感羞耻到“从容追忆”, 从一味回避到理性表述, 经历了非常痛苦的心理历程, 花了整整160年的时间。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这样一个伟大民族, 尚且如此, 何况其它! 所以, 对马来友族应该抱有充分的谅解, 十分的耐心, 相信他们也会有“因为自信, 所以坦然”的那一天。那一天, 是“社会整体心态的转变, 思想的开放, 观念的突破”。到那一天, 一切论争与隔阂都将烟消云散, 叶亚来作为巫华共同拥有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将得到巫华各族人民的共同珍惜、永远呵护。

参考文献

- , 1977,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陈丽华, 《华人领袖开埠功臣·马来西亚华社隆重纪念叶亚来》,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7-04/24/content_6020487.htm 2007年4月24日。
- 陈江, 《坦言开埠》, 《解放日报》,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26日。
- 陈亚才, 2006, 《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 吉隆坡: 吉隆坡广东义山管理委员会出版。
- 刘崇汉, 1998, 《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 吉隆坡: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出版。
- 柯雪润 (Cartens, Sharon A.) 著, 陈俊华、李宝钻译, 1992, 《从神话到历史: 叶亚来和马来西亚华人英勇的过去》, 《海外华人研究》, 第2期, 页241-256。
- 李业霖, 1991, 《论叶亚来》载刘崇汉编著《甲必丹叶亚来》, 巴生: 刘崇汉出版。
- 李业霖 编, 1997, 《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 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出版。
- 许云樵, 1979 (1990), 《客家人士在东南亚》, 载谢佐芝主编《世界客属人物大全》, 新加坡: 崇文出版社。
- 张卫东、王洪友, 1989, 《客家研究》(第一集),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 甄丽仪, 1999, 《叶亚来与吉隆坡的开发——兼论其在马来西亚历史地位的转变》, 台湾: 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学士论文。